

从“赛先生”到科学主义批评：从符号话语系统变迁看当代中国文艺批评话语的建构

安 静

【摘要】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赛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的是象征符号的作用，成为时代对大众启蒙的精神旗帜，这种象征性使“赛先生”蕴含了从科学走向美学的内在契机；科学主义在“八五新方法”的历史进程中属于指示符号，完成了“美学热”所带来的文学批评方法多元化的使命，属于专门的学者研究。两次科学主义的进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是接续而进的，但二者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却截然不同，这背后是文化与文学符号系统的深刻变化。研究考察百年的科学主义对文学研究的深刻影响，至少可以得出三方面的启示，分别是传统文化符号的不可替代性，人文主义符号话语系统的不可缺失性以及中国当代自主性批评话语系统建立的比较对话性。

【关键词】符号；赛先生；科学主义批评；文艺批评话语

【作者简介】安静，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艺术符号学（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成都），2019.7.174～17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艺术符号学的本土化与自主创新研究”（18BZX143）阶段性成果。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首次提出：“国人而欲脱愚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2]（P.318）}。至此，陈独秀标举起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两面旗帜——德先生和赛先生。然而，在两位先生之间，中国文化的运动方向却发生了明显的价值倾斜，赛先生取得了更加优势的地位，对中国传统国学和现代文学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3]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文学领域再一次高扬起赛先生的旗帜，这一次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被强烈移植进入文学批评，因而被命名为“科学主义批评”，1985年也因此被称为“方法论年”。

在我国学界，关注赛先生与科学主义批评的知

识谱系、精神建构、意义影响的论文、专著都不在少数，但是，从符号论的角度关注这两次科学主义的文献却并不多见。要知道，任何文化的变革，其实现途径要通过符号来完成，也必然体现为符号构成、符号句法以及符号用语的变化，而且符号系统的变化是更为根本的变化。汪晖在谈到现代中国科学共同体时认为，符号系统的变革是社会政治秩序、伦理秩序重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源泉。^{[4]（P.921）}无论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还是在科学主义批评过程中，符号系统的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带来了白话文对古文的胜利，一个带来了文学批评方法的多元化，进而从学术研究的导向上推动了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此为引入符号学研究的第一个理由；第二，我国学界对赛先生取得绝对权威早有定论，而对科学主义批评潮流的评价结论却多数比较负面，认为当时的“研究者对科学的理解非常表面化，仅限于搬弄一些新鲜名词，并未涉及研究对象的本质问题，无助于对文学现象

的深入认识”。^[5]同样是科学主义旗帜的高扬,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高下立判的结局?在面对深层原因的细究过程中,符号学的研究的确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本文试图对两次科学主义的产生、发展,特别对文学艺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度细读,重估科学主义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并对当代中国批评话语的重建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从科学走向美学: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不可忽视的精神内核

一百年前,两位先生同时被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推上历史舞台,然而赛先生却走在德先生之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引领者,对我国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年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6]除了“科学是使中国传统学问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这不仅在范围较广的‘国学’和史学领域表现突出,在专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方面亦相当明显。”^[7]其中原因除了现代科学与学科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之外,“赛先生”本身以及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所逐步酝酿的审美内核,也更加推动了赛先生权威地位的取得。那么,这个审美内核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可以从“赛先生”的命名入手进行分析。

从词源上来说,“科学”对应的英文 science 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 scientia,原来的意思是指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从古代到中世纪,自然科学知识和其他学科的知识是共生在一起的,其动词 sciō 即“知道”,相当于英语的 to know,在古希腊人那里就是“认识”(episteme)。德语中的 Wissenschaft 来自动词 wissen,同样意为“知道”,也与“知识”相关;法语的 science 和德语的 Wissenschaft 含义较为宽泛,不仅指自然的知识,还包括关于社会的各门知识以及哲学。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科学”才具有了一个特别的含义,即指建立在数学与实验基础上的、对于自然和社会进行专门的研究。因此,在科学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健全的知识体系之前,它一直被称为“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按照古典主义和人文

主义的传统,自然哲学一直被划定在人文的范畴内。只有到了启蒙运动之后,追求清晰化的倾向在学科建制,形成一个个分门别类的学科,自然科学才取代宗教成为思想生活的中心,^[7]而这也是一个较为晚近的概念。

在此前提下,“科学”可以分为知识、方法与精神三个层面。科学知识是现代学科分化所进行的分门别类的知识层面的研究,其方法包括厘清现象、从现象形成规律、建构理论以及检验理论;科学精神则指向一种价值观。显然,在新文化运动中,我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文化的变革来实现民族危亡的救治,这一点构成新文化运动最初的逻辑起点和认识初衷,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早就超越了科学知识的传播,而更加重视科学精神的传达,因而具备了信仰的维度。“在这个意义上被提起的民主与科学,它们的批判性意义要远远高于他们的建构性价值”。^[8]这一点,即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从具体的知识与方法走向宏观精神建构的前提条件。

我们可以从皮尔斯符号学的角度,对“科学”这一符号所对应的三个层次进行解读。皮尔斯(Charles Peirce)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与符号学的创始人,皮尔斯认为,构成符号的三个维度分别是指号(sign)、对象(object)和阐释(interpretant);其中对象和符号的铭写之间可以分为三种关系:像似指号(icon)、指示指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也译作规约符号)三部分;^{[9](P.4-5)}像似指号的建立方式主要基于“像似”,就是说感知形式与所指非常相似,如我们用“嗡嗡”来表示蜜蜂飞舞的声音;象征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联系来自于约定俗成,也就是文化的内涵和意义更多一些;指示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联系介于像似指号与象征符号之间,也就是同时具备一定的相似类似性,但更重要的是自然逻辑之间的因果联系,也有文化的规约作用体现在里面,如烟与火之间的自然联系,就属于指示指号,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则具备了文化意义上的约定俗成。这与我们所熟知的索绪尔符号学二元对立的建构模式非常不同。索绪尔认为,符号和意义之间,主要依赖于约定俗成,这就基本上悬置了像似指号与指示指号,这一点,对于从象形文字发展起来的汉语尤为不适用。

具体到“Science”这个词的命名,我们可以从皮尔斯的符号学获得很多新的启示。从上文的词源考证来看,“Science”这个词,其实可以从意译的角度翻译为“格致”,近代西方传教士傅兰雅就曾经这样翻译过,并以之来命名杂志《格致汇编》^[10]。“格致”完全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最早见于《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注:“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11](P.4)}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即通过即物穷理,来推极人的知识。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我国学界并没有接受这个源自中国古典文化的“格致”之论,而是普遍接受了日本思想家西周转译过来的“科学”,^[12]但在传播过程中并没有用“科学主义”的旗号,而是自创了一个新词“赛先生”,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赛”是“science”的部分音译,即采用了像似指号(icon),而“science”所包含的三个含义——知识、方法与精神,在皮尔斯符号学的关照之下可以这样理解:知识和方法是“science”的指示对象,而科学精神则是“science”的象征意义。“赛先生”中的“先生”并不是舶来品,是源自我国传统文化,最初的含义“头生”,《诗·大雅·生民》:“诞弥厥月,先生如达”;进一步引申为“年长有学问的人”。那么,“先生”虽具备象征符号意义,但“年长”的这种自然联系是更主要的,因此在这里构成一个指示指号;也就是说,在“赛先生”一词的构成中,是通过像似指号(赛-“science”)与指示指号(先生)的联合,进而形成一个象征符号——赛先生,因而science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指示指号,变成一个时代精神文化引领者这样一个象征符号,可以说从一个普通名词science变成了以大写字母S开头的、带有神圣意味的Science。“科学一方面提供了新旧、现代/传统、西方/东方、进步/落后的基本分界,另一方面又将自身置于一种与其他领域完全区分开来的,独立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影响的位置上。”^{[13](P.108)}可见,“赛先生”这个名称本身,恰恰暗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在科学研究中,知识是属于专门的、个人化的领域,是属于个人认知范畴的钻研与拓展,而在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从个人的专门的知识占有走向大众的启蒙,而这

个历史过程,并不是由“科学”自己独立实现的,赛先生完成启蒙的途径,是指向个人情感与审美的美学来完成的。所以,用科学取代理学,用进化论重新整合宇宙天地秩序,最终要体现为社会通行符号系统的改变,就是要体现为白话文对文言文的淘汰和胜利。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至此,“科学”具体化为文字语言符号的根本性变革,科学主义早已溢出自身的范围,从而幻化为启蒙、自由、个性、批判等美学命题。五四一代的仁人志士,弃医从文、弃机械从文者比比皆是。最终,赛先生将中国古典文学与古典文化引入了世界现代文学的序列,完成了文化符号表征系统的彻底革命,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人的思维构成方式、学术研究与情感表达方式。

首先,是人自身的解放,把“人”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繁冗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胡适是自由主义的提倡者,文学“八事”的潜台词就是个性解放呼声,他说:“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14](P.132)}Individuality的词根是“divide”(即“分开”),加上否定前缀“in-”,“个人”就是“不可分割”的社会最小单元。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率先体现为个性的解放与自由,如同钱理群先生总结得那样:“毫无疑问,五四的时代最强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5](P.315)}

其次,将文学从“载道”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所谓“现代文学”,其实质是文学的现代化,文学与科学、道德、政治、宗教的相揖别,是“纯文学”的独立和分化,“将审美凸现于现代文学价值的中心”。^{[16](P.2)}进而建立属于现代的文学,这既是文学的科学化,也是文学的现代化。胡适用自然科学的知识重新评价小说,他将社会比喻为大树,而小说就是这棵大树的“横截面”,“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17](P.273)}与小说地位的提高相联系,对小说的研究也体现出了现代科学研究的精神,如胡适的《〈水浒传〉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都体现了鲜明的科学实证精神。

再次,新文学首先要求“言之有物”,而胡适所谓的“物”就是个人化的“情感”和“思想”,而不是古人所说的“文以载道”。提倡率真的个性化的写作风格,就要抛开古人的陈词滥调,这就是胡适所说的“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18]胡适强调,要写真性情,方为真文学。所以,写爱情、写时代成为文学的主要内容。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提倡“为人生”的写实态度,在作品中存在大量细节和客观事实的逼真描写;在创造社作家笔下,充满了对自我任性的尽情抒发与深层拷问。

二、从美学走向科学:科学主义批评多元方法的深层影响

科学主义批评潮流与赛先生从科学走向美学恰恰相反,历史的发展轨迹是从美学走向了科学。为什么要这样说,这就需要我们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语境之中。“文革”结束之后,当时社会还弥漫着“两个凡是”的阴霾,社会思想与情感心理并不是能够一下子真的进入“新时期”,十年浩劫所抛出的僵硬的社会意识形态,都需要一个转换过程,而这个转换的过程,恰恰是美学完成的。当时,一本美学著作的问世,发行量可达数万册乃至数十万册;一位美学家的讲演,被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围得水泄不通。美学最初的含义是感性学,主要研究人的审美感受,而“八亿人民八个样板”的十年,最不能谈的,就是“感性”,就是人们对“美”的渴望。可以这样说,八十年代的美学热结束了一个一元化的时代,完成了社会思潮从“文革”走向新的启蒙,科学主义批评热潮则真正使社会审美与社会思潮走向多元化。钱中文与童庆炳在《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的序言中写道:“方法的多样化更加促进了理论的多元化。这种景象还是我们在80年代初所梦寐以求的。”^{[19](P.4)}与赛先生所在的新文化运动时代精神旗帜的符号意义不同,这一次的科学主义更多成为“方法”这个指示符号的代称。

1985年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年”成为突出代表,一般将这一时期的方法概括为“老三论”和“新三

论”。“老三论”包括系统论批评、控制论批评和信息论批评;“新三论”包括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在文学批评研究中的运用。文学批评界对新的方法的探索相对集中于1985年前后,因此也被称为“八五新方法”。林兴宅在《文学研究新方法论》的序言中说:“没有方法的进步,就没有科学的发展。近年来,文艺科学方法论变革的重要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20](P.1)}与“赛先生”的分析类似,我们还是回到这一次思潮的命名分析上来。

在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的命名主要涉及“符号”层面的意义;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主义批评”的运动中,科学主义的命名更多回到了指示指号(index)的层面,体现为科学知识 with 科学方法的运用。作为文化的象征意义,是由美学在科学主义批评之前完成的,因此,这一次主要是批评的知识与方法在各类文学作品中的结合和运用,其所指是人的认知方面,而不是情感方面。在此前提下,与赛先生侧重精神层面的引导不同,知识与方法必然走向小众的专门研究,而不是对大众的精神启蒙,所以,科学主义批评所涉及的范围以及产生的影响,与赛先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科学主义批评主要是一次艺术的“突围”,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突破反映认识论对艺术的限制,在整个探索过程中蕴含着对艺术独特性的探讨、对审美与情感的研究等诸多美学问题。就文学研究而言,科学主义批评潮流对当时文艺批评走出“本质主义”、“典型论”等陈旧的思维模式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科学主义批评潮流带给学界认识思维的转向是科学主义潮流产生的第二个重要影响。这个问题与一个曾经非常显学的历史命题的反转相关,这就是李泽厚关于“形象思维不是思维”这一命题所带来的深层思考。关于形象思维的全国讨论共有两次,第一次持续十年,与美学大讨论同步,艺术形象的产生与特征等命题,构成了美学大讨论的核心话题。本来,形象思维在1966年之前已经写入了各种版本的高校教科书,成为文学艺术思维过程的定论;但在1966年第5期《红旗》杂志高调刊登郑季翘的文章《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将形象思维理论禁区化,再坚持这个论断就成为反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者。第二次形象思维讨论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前,从1977年后半年开始,文艺界组织一系列研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1977年12月31日同时刊发《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终于给形象思维问题彻底翻案,这一命题的反转直接构成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前奏。可以说,在中国当代美学与当代文艺理论史上,两次形象思维讨论都构成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中似乎淡出了学者的视野,李泽厚公开宣称形象思维不是思维,这是怎么回事呢?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霍松林的文章《试论形象思维》(《新建设》1956年5月号)得到了广泛回应,是引发形象思维讨论的第一篇文章。霍松林是肯定形象思维的存在。随着讨论的展开,美学大讨论中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李泽厚,在他的成名作《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中,不仅对蔡仪、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概念:美感二重性、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从而被学界认为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自成一派,有力地推动了美学大讨论的进行。在这篇文章中,李泽厚几乎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形象思维这个问题,后来又单独撰文《试论形象思维》(《文学评论》1979年第2期)。正是李泽厚使形象思维与美学大讨论的关系从隐性到显性地联系起来。李泽厚首先肯定了形象思维的存在,并将之看成是一种“认识”：“思维,不管是形象思维或逻辑思维,都是认识的一种深化,是人的认识的理性阶段。人通过认识的理性阶段才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把握。形象思维的过程在实质上与逻辑思维相同,也是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的一种认识过程。”^[21]然而,到了1985年,李泽厚却公开宣称:“形象思维并非思维,就像机器人并非人一样”^[22]。在看似前后矛盾的结论中,李泽厚其实表达了一个新的理念,即艺术并非属于认识这样一种观点,正式提出了“艺术走出认识论”的命题。“李泽厚的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形象思维’讨论的分水岭。从这一篇文章起,‘形象思维’的讨论就开始走下坡路。”^[23]宣告形象思维讨论走下坡路,其实也是全国美学和文艺理论不再局限于原来的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论、形象思维论,艺术不再属于单纯的认识论范畴的问题,而是从科学方法的多样性开始,走向了审美的认知方法多元的道路。这一次理论的转变,理论界对文学艺术的观点又走向了新的领域,这就是“符号思维”。^[23]

告别俄苏文学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的单一性,中国文学走进了世界当代文学的大家庭,这些成果最终体现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所使用的符号话语系统变迁。从创作层面而言,方法的多元突破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98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开启了中国文坛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声,欧美现代派作家和作品引起中国文坛的强烈关注。早期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春之声》,都使用了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后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作品,都为文学创作突破现实主义、探索新的方法做出了新的贡献。就批评方法而言,1985年的方法论探索,一方面带来批评方法本身的重要突破,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从批评方法到文学基本理论深度思考。林兴宅的《艺术生命的秘密》(《当代艺术探索》1985年第2期)、肖君和的《关于艺术系统的分析和思考》(《当代艺术探索》1984年6期)、鲁枢元的《试论文学语言的机制》(《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等,都从方法本身走向了方法论反思,走向了文学和艺术基本原理层面的探讨。可以说,赛先生使中国文学的话语从古代走向现代,而科学主义则使中国文学批评走进了当代的时间进程之中。

三、从赛先生到科学主义批评:符号系统变迁之后的当代启示

首先,从两次科学主义的命名变化上看,我国学界对科学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是精神的引领者,整个国民心态对科学也是崇尚而热烈拥护;在80年代的科学主义批评潮流中,只是直指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的方法,已经有了明确的界限,并没有像赛先生那样形成长时间的压倒性优势。对自然科学的方法在短暂的尝试之后,就开始了深度的追问与反思,如姚文放发表于《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的《文学传统与科学传统》,就明确

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其次,从符号系统的变化来看,新文化运动使我国的文化表达系统呈现了根本性的变革,白话文战胜文言文,古文系统虽然经过短暂的震荡,但依然被完整地留存下来;科学主义批评浪潮可以说接续着赛先生的进路,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批评中的成果更为丰富。例如,真正让系统论批评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方法,就得益于林兴宅发表于1984年第1期的《鲁迅研究》上的论文《论阿Q性格系统》,控制论批评的研究者黄海澄,则用控制论探讨美学热中的美感、美的客观性等一系列问题。在上述两个变化中,我们至少可以从古代文学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符号话语系统、白话文所代表的现当代文学符号系统、科学主义所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符号话语系统,以及与科学主义所相对的、审美感性学所代表的人文主义符号话语系统之间的辩证张力,来看待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话语系统的建构过程。

第一,中国传统符号话语系统的不可替代性。尽管自然科学的方法被不断尝试进入各种文学作品,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可以看到,这些新的方法在古典文学批评中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古文系统以其历史积淀的独属于中华文化的符号组合方式,相对于西方而来的批评方法虽然看似滞后,但却更能够以这种“滞后”显得沉稳,在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运用上,往往选择一些更能够从批评方法沉淀进入基本理论建构的方法,如新批评关于文本的细读方法,范畴的专门研究等等。中国的古典文学系统在一开始,由于其符号系统的句法、语用与现代白话文迥然相异而成为赛先生的对立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却一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自主性话语系统建立所要回归的精神家园。在世纪之交,我国学界曾大声疾呼,我们的文学批评与文论研究存在严重的“失语症”,所运用的概念、术语、思维方式缺乏传统文化的根基,建国十七年是俄苏文论的一元时代,进入新时期是西方文论的霸权雄踞,这是“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24],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五四打倒孔家店、全面抛弃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断裂使然。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基因,虽然在传承过程

中会遭遇到各种扭曲甚至是非常困顿的局面,然而,传统始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是不能完全与历史割裂的。无论是赛先生的精神引领,还是后科学主义时代的“失语”危机,其实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第二,人文主义符号话语系统的不可缺失性。尽管科学主义以精确的理性著称,它将科学视为唯一或者最有价值的知识。然而也正是这种理性,更加让人容易走向理性的极端。“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25](P.196)}这就从科学走向了唯科学主义。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无神论国家,就更容易让唯科学主义大行其道。其实,无论就科学的历史起源或者是科学的现实形态而言,科学知识与人文学识都并非截然隔绝,当科学的知识用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进而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一系列解释时,便被赋予了人文的内涵: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在“言”“意”之间的辩证张力总是投射着人文的意蕴。然而,随着启蒙运动与近代学科的分化,科学与人文的隔阂便越来越深,甚至在科学叠加技术之后,形成科学主义的霸权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各自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分别指示着不同的意义内涵。“就个体而言,以上分野和对峙所导致的是内在精神世界的单一化与片面化,它使个体往往或者接受数学、符号构成的世界途径,或者认同诗的意境;二者各自对应于数理等思维方式和诗意等言说方式。从整个社会范围看,科学与人文的对峙则往往引向文化的分裂及主体间的隔绝。”^{[26](P.245)}就中国当代的批评话语建构而言,人文主义一方面很大程度蕴含在与科学主义相对的中国古典文学、文论与文化所形成的语言符号系统中,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往往互为补充,各自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缺一不可。

第三,中国当代自主性批评话语系统建立的比较对话性。就宽泛的意义而言,科学应该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但从更为严格的具体的知识形态而言,自然科学毫无疑问更具代表性。当我们追溯到自然科学的形成时就不难发现,自然科学

的成立前提是以人和自然的分离为基本前提的;以此推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是以科学的合法性模式建立为重要标志的,因此才呈现出科学意味着进步,而传统意味落后这样一种“并不科学”的话语模式。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一种“镜像”关系,在彼此的映照之下,他们各自独立的主体价值才被显现出来,可以说这是一个相互成就的过程,传统文学与文化经过赛先生所引领的新文化运动而显现出自身的局限性,又在科学主义批评方法的喧嚣中彰显出自己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对待历史不必苛责,矫枉往往要过正,一时情势使然。索绪尔符号学体系的“能指”、“所指”已经成为符号学研究的集体无意识,但不能忽视的是,在符号研究中,其实还存在着像似指号与指示符号的问题,在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背景下,不能仅仅看到能指与所指,还要具体分析符号的标指问题。以赛先生和科学主义为例,它们都是现代介入中国文化的概念,它们的内涵变化,我们很容易出现非此即彼的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误读与误解不可避免。赛先生虽然是引领社会文化前进的“先生”,然而过分割裂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终于造成后代文化失语的伤痛;科学主义虽然标举“主义”,然而在方法层面的多元拓展也带来了社会思潮的革故鼎新。当代,我们已经处于中西文化深入交融的21世纪,文化自信的号角不是仅仅在故纸堆的重新翻腾中奏响的,而应该是在多重话语的博弈过程中,经过古今中西文化的不断交流历练完成的。进入21世纪之后,立足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学术发展历史,对中西学术话语范畴的比较研究,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对话交流必不可少,这就需要我们这一代学者在不同语境、不同内涵的符号之间,做好做深比较研究的功夫,以开放的胸襟迎接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对话,是为当代中国文学与艺术批评话语系统建构的可行性途径。

参考文献:

- [1]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1).
 [2]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A]//陈独秀文章选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3]李丽.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权威的确立[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4]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5]张毅.“赛先生”与中国文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7(2).

[6]胡适.科学与人生观[A]//张君劢,丁文江.科学与人生[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7]高建平.“美学”的起源[J].社会科学战线,2008(10).

[8]刘勇,张悦.百年五四:“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精神建构[N].文艺报,2017-05-03.

[9]美]皮尔斯.论符号[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10]英]傅兰雅编.格致汇编[C].上海:上海格致书室,1890.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汪晖.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使用[J].学人,1991(1).

[13]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4]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A]//胡适作品集(第6集)[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

[15]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A]//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C].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16]旷新年.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7]中国新文学大学·建设理论集[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18]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

[19]钱中文,童庆炳.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总序[A]//胡经之.文艺美学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0]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21]李泽厚.试论形象思维[J].文学评论,1959(2).

[22]李泽厚.形象思维再续谈[J].文学评论,1980(3).

[23]高建平.“形象思维”说的发展、终结与变容[J].社会科学战线,2010(1).

[24]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鸣,1996(2).

[25]美]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董世俊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6]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与衍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